

家训里文学思想的另类体现

— 以《颜氏家训》为讨论中心 —

叶 秀 清*

— <目 次> —

I. 序 言	IV. 家训结构中文论特色二：尚实论
II. 家训结构中《文章》立篇的意义	V. 家训结构中文论特色三：折中论
III. 家训结构中文论特色一：文祸论	VI. 结 语

I. 序 言

《颜氏家训》被视为古今家训之祖，又被推崇为“家训文学之大成”¹⁾。他将文学论述引入家训里的这个做法并非史无前例，现存可见的有颜延之《庭诰》(《全宋文》卷三十六)和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全宋文》卷十五)，稍后有南齐张融《戒子》、《门律自序》(《全齐文》卷十五)，梁朝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与湘东王书》(《全梁文》卷十一)与王筠《与诸儿书论家世集》(《全梁文》卷六十五)，唯这种家训与文论结合的独特形式终究是属于少数的做法。颜之推在著述《颜氏家训》时，不仅扩大家训的容量，充实家训的内容，还专辟了一个篇章讨论文学，这显示了颜之推对文学的关注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论述文学的角度也自有其独特性，这与其承载体的家训特质息息相关。家训内容的规范性强，内在蕴涵深厚的血缘亲情，这内外合一的元

*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1) 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东方出版社，1997，167页。

素就是家训性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家训文体历久不变的精神所在。在《颜氏家训》里，由于颜之推的特殊经历与处境，致使其家训特质进一步被强化，文中论述无不受其影响，这当然包括集中反映其文学思想的《文章》篇在内。虽说家训与文论两者性质不同，但当颜之推将单篇的文论纳入在整个家训框架里，使之结合为一体时，两者的内在理路与精神隐含着高度的一致性。从逻辑上来说，家训特质的主导性要强一些，牵制着整部著作的叙事动机与方式。日本学者兴膳宏在八十年代就曾指出：如果说颜之推对文人的论调更为严厉，这应该看作是由《家训》的性质所决定的。²⁾

这段话基本上受到学界的认同，并常为后来的学者所引用。比如张志宏与佟艳光在论文里都分别援引兴膳宏上述的观点，但两人引以为证所得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张志宏在2008年发表《从家训性质解读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他在文中结语表示颜之推的文论有部分受制于家训的体制，因此需要从家训性质出发，才能给予正确的解读。³⁾对此，佟艳光则深表不然。她在2009年发表以《南北朝文德讨论的终结——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为题的论文，文中指出颜之推的文学思想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这个见解是正确的，但她进一步又说“与其家训性质并无必然联系”⁴⁾，这句话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以下拟从《文章》篇在《颜氏家训》全书结构的位置，以及其与诸篇关系对比之下所彰显的特征给予说明。

II. 家训结构中《文章》立篇的意义

《颜氏家训》各篇虽说非一时之作，结构亦不甚严整⁵⁾，但大致可看出全

2) [日]兴膳宏、彭恩华译《六朝文学论稿》，岳麓出版社，1986，106-107页。

3) 张志宏，〈从家训性质解读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66页。

4) 佟艳光，〈南北朝文德讨论的终结——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辽宁大学学报》，2009(3)，39页。

5) 详见曹道恒、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79页。

书内在的思考脉络。首篇《序致》与末篇《终制》相等于全书之序言与后记。《序致》之后，其后连续四篇——《教子》、《兄弟》、《后娶》和《治家》即扣紧“整齐门内”的目的以立说。家庭和睦与治家适度是免于门户之祸的关键，因而置于卷首。其次，家风乃其家族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是文化士族立足之根基、荣辱之关键，因此随后设置《风操》、《慕贤》、《勉学》与《文章》四篇。这些篇章的设置关乎礼教、贤哲、学术与文学不同的学习内容，大致又与士大夫生活中家族宗亲、邻里宾客、朝廷君臣与文坛雅士等主要几个大团体密切相关。《文章》之后的篇章大致可分两大类：《名实》、《涉务》、《省事》、《止足》与《诫兵》等诸篇，主要着重于求实、致用、静退自守、少欲知足、好武为戒等观念的灌输，其中不少是针对官场上自处之道而言。其次，《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等诸篇，则紧扣士族身心保养、宗教信仰、学术与文艺活动来立论。

仔细剖析，以上篇章按类被集中与并排在一起，这恐怕隐含了颜之推的一番苦心。他为子孙深谋远虑，将家族所牵涉的各层人际关系、各项事务、各种状况、各类活动，其中所需的多元知识，具体实践方法与根据，以及言行身心数个层面等问题都纳入考虑。其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缜密思路，广涉多面的告诫内容，无不印证古人所谓“爱之深，故虑焉而周；虑之周，故语焉而详”⁶⁾的话。作为以文化优势仕进的家族，文学与礼教、学术的积极学习等至关重要，被视为是保障家族命脉、利益与地位的有效手段。因此可以说是这种强烈的家训精神赋予了《文章》独占一篇的位置，并使它与其它诸篇连贯为一。

其次，亲情与乱世内外双重因素的驱使下，颜之推临老抱病著述，将毕生最精华的经验与思考心得倾囊相授。他在《颜氏家训》里所投注的情感之深、忧虑之切、督促之急，恐怕就超越不少家训作品了。颜之推于全书首篇明示著述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末篇重申书怀告诫之志，乃至结语仍不忘重复叮咛“以传业扬名为务”。爱之情深，故“后寤”与“劝诱”之语屡现文

6)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60页。

中。全书语调“切切婆心，谆谆诤诫”，即便是千余年的颜氏后裔，读之犹如“当面说话”⁷⁾。忧患至极，又不禁直呼“慎之哉！慎之哉！”、“诫之哉！诫之哉！”颜之推自身甚至积极地参与到家训叙述里，以劝导者、示范者、批判者等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文中。比如《止足》篇他以自己“终身服膺”祖训为示范，《名实》篇则载入他“为人所毁”的切身经验以为戒，至于规劝之语“繁而不容自己”⁸⁾，对历史与时俗人事的点评论述，那更是不胜枚举。

以此审视《文章》篇，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到“父母之戒其子也，谆谆乎惟恐其不尽也，惻惻乎唯恐其不入也”⁹⁾的心意。比如从学作文章的起步阶段，到具体创作的细节，以至文坛上点评文章的注意事项，颜之推都考虑得周全而细致。此外，积极将自身融入叙述的习惯也同样出现在《文章》篇里，如不少警戒之论调，大量载入“勿强操笔”、“幸须避之”、“不可辄代”等规范性内容；载入“以此忤人”的切身经验之余，又引入自身“家世文章”以为子孙榜样。《颜氏家训》诸篇时时关注时事的态度也显见于《文章》篇，比如北齐当时文坛氛围、文学交流习气、文人赋诗论文的各种行为等都罗列其中。

从《颜氏家训》诸篇与《文章》篇文中所蕴含的情感深度，与撰述者在行文中积极参与的表现来看，两者共同之处皆有迹可循。若再深入到两者的思想层面作分析，便会发现从《文章》篇主要三类论述所概括出来的文学思想特征，显然与其家训思想特征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便更强而有力地论证颜之推的文论与家训的精神是互通相连的，下文思路基本如此。

III. 家训结构中文论特色一：文祸论

史上文祸事例多不胜数，乱世之际，尤受文化士族所关注。曹丕批判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后人沿此继续对文人德性与其遭遇这种因果

7) 同上注, 556页。

8) 同上注, 547页。

9) 沈德潜选、宋晶如注释,《唐宋八大家古文》,中国书社,1987,657页。

关系逐步深入讨论。从后来韦诞、袁淑、刘勰、萧子显、杨惛到姚察等对此问题的论述发展来看，有的认为文人之不幸导源于其自身“浇薄险忌”、“窃”、“谄”、“贪”、“诡”等缺德失节的行为，但至于归咎为文人“肥戆”、“体弱”、“麤疏”、“疏诞”、“精密”、“轻脆”等因素者，则更偏向于个人气质、个性与作风方面的问题。此外，刘勰又指出文人之“职卑”也是导因之一，而姚察更进一步指出文学“妙发性灵”的特点对上述这些文人之瑕累含有催生与诱发的副作用。¹⁰⁾由此可见，因文致祸的原因实多方面，若将这些相关论述都笼统地概括为杨惛所说的“文德论”，这恐怕不甚妥当。另一方面，这些论述所深藏之忧患意识始终如一，其强烈程度有增无减，比如文中特别强调文人之名节不立、“不甚见用”，乃至“忤人”而“害己”、“殃速”而“祸及”等恶果，据此本文以“文祸论”这个统称来进行以下的论述。

长期活在“惧罹谤讟”(《止足》)¹¹⁾的阴影之下，自然也使颜之推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他将这个问题放在首要讨论的位置上，在《文章》篇开端不久随即展开长篇申论。除了刘勰所列的十六个文人之外，他还猛增了另外二十位“文坛翘秀者”¹²⁾，似乎意犹未尽，又将“天子而有才华者”以及其他史上有盛名者也给罗列进来，并聚焦于文祸的因果两面来谈。颜之推同意众论，认为文祸主因在于品德之亏损不正与才性之偏激张扬，其次也有政治因素。¹³⁾在政治斗

10) 相关言论分别见于曹丕《与吴质书》、《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韦诞之言、袁淑《吊古文》(《全宋文》卷四十四)、刘勰《文心雕龙·程器》、萧子显《南齐书·刘祥传》之史臣论、《魏书·文苑列传》引杨惛之《文德论》，以及《梁书·文学传论》引姚察之言。

11) 以下凡引文出自《颜氏家训·文章》以外诸篇将仅注其篇名。

12) 以下凡引文出自《颜氏家训·文章》，将不再另注明出处。

13) 按颜之推评断文人的措辞来看，宋玉之“体貌容冶”，司马相如之“窃费无操”、王褒之“过章《僮约》”、扬雄之“德败《美新》”、李陵之“降辱夷虏”、刘歆之“反覆莽世”、傅毅之“党附权门”、班固之“盗窃父史”、马融之“佞媚获谄”、蔡邕之“同恶受诛”、吴质之“诋忤乡里”、曹植之“悖慢犯法”、杜笃之“乞假无厌”、潘岳之“乾没取危”、谢灵运之“空疏乱纪”，此等皆偏向于从道德规范方面来贬斥；而屈原之“露才扬己”、东方朔之“滑稽不雅”、赵壹之“抗竦过度”、路粹之“隘狭已甚”、繁钦之“性无检格”、陈琳之“粗疏”、刘桢之“屈强”、王粲之“率躁”、孔融与祢衡之“诞傲”、阮籍之“无礼”、嵇康之“凌物”、傅玄之“忿斗”、孙楚之“矜夸”、颜延之之“负气”谢

争中，文人的政治取向便足以断送其性命，更何况其品德不正或才性激扬者？这些综合性因素促使文人被黜、失节与丧命之事增多与加剧，屈原、杨雄、嵇康、潘岳、陆机、颜延之等皆难逃此厄运。颜之推增设大量的事例，由此显示他着力于彰显沿此而损名丧命的恶果，并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的普遍性。

虽然颜之推肯定了“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功能，然而他却据此而引以为文人致祸的根源，这使他与刘勰、新变派众说大相径庭，甚至被人批为偏颇过激。¹⁴⁾ 颜之推首要考虑的是，过分强调文学的抒情性，任其情深而摇荡，将“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最终因言行失度而致祸。他的忧虑还进而延伸到眼前“今世文士，此患弥切”的现象，并高调提醒此患“惨于矛戟”、“速乎风尘”的严重程度，又慎重告诫“深宜防患，以保元吉”。

颜之推基本上秉持众论所谓文人因“伐能”、“负才”、“恃才”以致祸患的观点，然而就其关注与深论的程度而言，显然是远远超越前者的，他甚至被为南北朝时期相关论述的“集大成者”¹⁵⁾。除了文人无德失节以致祸的问题之外，他的思虑又延伸到其它可能致祸的各类文学活动，并习惯性以后果预计为先的方式去思考。比如论文章天赋，则提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以免“流布丑拙”，招致“众共嘲弄”的耻辱；论“学为文章”，则提醒“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後出手；慎勿师心自任”，避免招致“取笑旁人”的难堪；论文章气势，则提示“以衔勒制之”，以免遭受“填坑岸”的灾难；论品评活动，则告诫要察觉北方“不通击难”的风气而发言谨慎，以免招致“以此忤人”的悔恨。至于具体写文章，颜之推罗列众例的目的是在于“知决纒缪”，又常特意彰显失误者作为“宏才博学”、“数千卷学士”的身份；时而高呼：“大雅君子，何其谬乎？”（《书

眇之“悔慢”，此则主要根据文人气质、才性与作风来评断；至于杨修与丁廙之“扇动取毙”、陆机之“犯顺履险”，以及王融之“凶贼自诩”显然是与其政治取向有关，而真正因文学因素以致被黜免的，恐怕要数冯衍一人而已。

14) 如李景华认为“偏激之极，无以复加”、“极善吹毛求疵”，见其著作《中国散文通史》(下)，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689页。周建江也持相同意见，认为“话太为偏激、太为激烈”，见其著作《北朝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4页。

15) 佟艳光，〈南北朝文德讨论的终结——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39页。

证》), 时而反复嘱咐“触涂宜慎”、即便是小瑕疵也提醒“宜慎之”。诸如此类的恶果叙述倾向致使文祸论成了颜之推文学观的一个显著特征。

无独有偶, 与文祸论叙述模式极为相似的例子也显见于《勉学》篇批判玄学的论述里。从何晏算起, 颜之推列举共十位玄学领袖, 并皆以其不得善终的恶果来论证玄学在实践上的难度。此外, 《颜氏家训》诸篇也不乏此类例子。比如他提出“养生者先须虑祸”(《养生》), 这恐怕是较为不一般的讲法, 至于其它各种轻重不一的恶果论述更是充斥文中: 论及治家失度, 严重者将导致诸子争财、兄弟相残、妻妾杀夫、“辞讼盈公门, 谤辱彰道路”, 乃至“暴露祖考之长短”等门户之祸(《后娶》); 教育不当, 则将导致命丧身亡、倾宗覆族、地裂兵亡等恶果。官场上“非道求之”者, 或“终陷不测之诛”(《省事》), 或“纵得免死, 莫不破家”(《止足》)。学而不精, 颇读兵书而“逞弄拳擊”者, “皆陷身灭族之本”(《诫兵》); 但即便是精擅于卜筮者, 若恰逢“世网严密”, 也将“多或罹灾”(《杂艺》); 《归心》篇又以“好杀之人, 临死报验, 子孙殃祸, 其数甚多”诸多因果相报之例子以作警惕。乱世之中, 周遭惨变与突变之纷至沓来, 因此不难理解后果预计为何是颜之推家训行文中最深刻的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因失礼与无学而招致讥讽与耻辱之事, 颜之推表现得极为在意, 以致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许多“儒雅罪人”、“俗间儒士”、“名儒硕学”、“邺下博士”、“江南权贵”等失礼、可笑、谬误、鄙陋、误导群众等事例充作反面教材; 对于书画、琴乐、博弈等杂艺, 颜之推屡次嘱咐勿以之自命, 告诫不可常使, 亦“不须过精”, 都无不从“见役勋贵”或“令人就愤”(《杂艺》)等后患予以考虑。此虽皆未至丧命灭族的严重地步, 但作为以文化仕进的家族, 防范败坏家风, 贬损身份之举也是不容忽视的事。

显然地, 存在于文祸论的高度防患意识实则灌满《文章》通篇, 乃至于《颜氏家训》全书。颜之推对祸源与恶果表现得异常敏感, “其心危, 故其防患深, 其虑详”¹⁶⁾, 从家训诸篇与《文章》篇几乎无所不包的内容, 缜密细致的思路, 以及对后果预计为先的叙述倾向来看, 可见文论与家训在思想深层面

16)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 549页。

上有连贯相通之处。

IV. 家训结构中文论特色二：尚实论

颜之推尚实思想倾向全然地反映在他的文学观。从实用的角度出发，颜之推认为经史百家之学最低限度尚可赖以维生，因此寄望子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平日又以“勤劳经史”(《勉学》)课督子孙，对于文学则说“必伐天才，勿强操笔”、“行有余力，则可习之”。显然地，文学的价值被置于经史百家之下，这与刘勰高抬文学价值的看法迥然有别。两人虽论文章本自《五经》，然则不过是貌合而神离。

颜之推尚实的倾向在文学功能与文士品评的论述里也表露无遗。他从“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高度肯定军国文翰类的文章，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的抒情性诗文则退居次位。相对于萧统对文学“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选序》)的功能给予充分的肯定，颜之推则表现得保守多了。至于致力于文学来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更不为他所认同，因此对比曹丕不把文学等同于事功，走在文学自觉路线的前头，颜之推又显得落后多了。

其次，他认为品评文士，关键不在于文才之高下，而是取决于能否以文致用与文德相符。因此，他说执笔为文，不在于“宏丽精华”与“动俗盖世”的文学成就，只要能做到“不失体裁，辞意可达”的才士就好，而才士最重要的就是能如《涉务》篇所说的，能在朝廷上“应世经务”，能胜任作为文史之臣“著述宪章，不忘前古”的任务。相反地，在其家训诸篇，对于文士而无用与无识者，颜之推有不少形象化的描述，如《勉学》描述士大夫“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世人读书者“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涉务》篇写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可见颜之推在文论与家训论述里都一致强调文士当以致用为贵。

颜之推深信“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名实》)，反映在文学

创作论上,必然倾向于对文章内容的探究。颜之推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这顺序清楚表明以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为本,表现形式为次的立场,其中文章之“理致”即是儒家之理。他又以“古人之文”为标准,进一步说明此实质内容即所谓“宏材逸气,体度风格”,而文中“逸气”与“气调”则必须适度调节,由此而体现在外的就是颜之推所引以为豪的家族文风——“正典”。以此为准则,对浮艳之弊、“去本弃末”的文风,乃至文人无德失节者,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进而使文德相符成了颜之推品评文士的关键条件之一。

具体创作细目上,异于刘勰对文学艺术手法的细剖深论,颜之推旨在“知决纰缪”。比如引用典故与文章地理错误百出、擅自更改古题本意、遣词用字失礼不当、语义不通、题名欠妥、代写哀伤凶祸之辞、刺箴美颂混杂同篇等该避忌的事都被纳入在内。这些错误明显暴露作者礼教学养水平之低劣,稍不谨慎即有侮辱与冒犯君长之虞,而此类丑事也可能被载入史籍,再加上当时“讳避精详”、“比语求蚩”、“反音求瑕”(《文心雕龙·指瑕》)的文坛风气等诸多因素,这都可能促使极力维护士族门风的颜之推更看重行文赋诗的正确性、正规性及合乎情理与否。至于非实用性的文学特征的讨论自然不是他首要考虑的事了,而他也决不会赞同张融“文岂有常体”之说,更别说向子孙发出“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全齐文》卷十五)的言论。

颜之推以“知决纰缪”作为创作指导细目,占《文章》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不仅涉及语义、用字、故实来源等学术问题,其中也包含了深厚的礼教知识,无怪颜之推的文论被批为带有“学究气”¹⁷⁾。对照其家训诸篇,则不难发现类似的内容与叙述方式并非《文章》篇所独有,《风操》、《勉学》、《书证》、《音辞》与《杂艺》等篇都是最好的例证。颜之推在这些篇章里纳入大量有关礼教、史学、文字、音韵、训诂等指谬正误的研究心得,不少所引事例还有意地揭示犯错与失礼的人来自于各界名流,而这被批为“义琐文繁,有资小学,无矣大体”¹⁸⁾的内容,实则如《文章》篇一样,隐含了颜之推在艰苦

17) 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88页。

环境下力保文化士族地位的一片苦心。

颜之推文学思想中的尚实论在其家训诸篇都能得到对应。《颜氏家训》里特设《名实》与《涉务》两篇，就已不言而喻地宣告其以务实为主的思想。仔细分析，两者论述各有偏重，《名实》篇重于论“巧伪不如拙诚”，《涉务》篇则开宗明义指出“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前者以虚伪为戒，后者以济世为能，二者兼融才契合于颜之推所力倡的务实之义。

以务实为重则易于导向以实效功利为目的的论，因此《勉学》强调“学者所以求益耳”；《涉务》则论证仕宦之道在于经世致用；论“养生”则声明须以“不废世务”为前提；论佛道则以济度苍生之利相劝。至于“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勉学》）的玄学清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的“星文风气”（《杂艺》）之学，两者皆因其无用而被否定掉。此外，颜之推关注增加效益的方法。比如论学，则强调“博涉”与“早教”；论治家，则提到婚姻素对与借书有道等规矩，其方法具体而可操作性高。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儒家思想里“学以致道”与“平治天下”的高远理想，颜之推关注更多的是个人与家族利益，比如谈“修善立名”的作用时，则劝善动俗与使子孙“获其庇荫”（《名实》）兼论；论读书的好处时，则立德化俗与自资求存并提。可见严酷的现实，逼迫颜之推将思想调整得更为务实，致使纪昀评其家训思想为“除却利害二字，更无家训矣”¹⁹⁾。

其次，高倡务实也将导向以虚伪为戒，而强调名实相符。《名实》篇以伪装孝子的显贵名流、请人代写诗文的士族、矫情造作以求声誉的县令，以及“治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之举为例，说明假象“不可长继，终露其情”，并以“一伪丧百诚”、前功尽废与沦为笑柄等恶果为戒。为了有效地检验真伪虚实，颜之推提出“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勉学》），至于评人论述则须“校其长短，覈其精粗”（《慕贤》）。于是，言行对照、理论与实践互证之下，凡“饭囊酒甕”（《诫兵》）、“道听涂说，强事饰辞”、“但能言之，不能

18)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561页。

19) 同上注，5页。

行之”(《勉学》)、“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涉务》)等有名无实,无济于世之徒皆无法遁形,势必遭其严辞鞭挞。这与他狠批浮艳之文风、无德之文人与矫饰之文辞的态度如出一辙。

V. 家训结构中文论特色三:折中论

折中论主要集中体现在具有争议性的文学话题上。比如经史百家之学与文章之学,孰重孰轻?对此,颜之推坚定地提出以“德艺周厚”(《名实》)为修身最高境界的主张,以“博学求之”为其途径,使经史百家等知识外,文章之学与琴、棋、书、画、数、医、射、投等各类杂艺也被纳入学习范围内,还说“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勉学》)。其次,北齐受南方文风北传的影响,兴起讲究声文之美、爱好轻艳之作的浪潮,崇尚“正典”文风的颜之推该何去何从?面对势不可挡的新浪潮,颜之推以“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为戒,进而提出“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的折中论,其文学创作上“文致清远”(《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七》)的风格或者可以视作他对此潮流自我调节的结果。同样地,对于文学军国实用与怡情悦性的两种功能,颜之推都加以肯定。他曾分别在《勉学》与《文章》篇里以“春华”比喻文学,认为无论在修身与治国层面上,都不应该忽视文学作为其充分条件,具备有效辅助与促进的作用。由此可见,颜之推肯定文学的两种功能,给予兼容并蓄之余,主次是分明有别的。

在文艺活动圈里,颜之推还是个活跃与高水平的参与者。他能从“入其滋味”、得其“深味”(《杂艺》)这个更高层次来体验乐趣,也能从文外之“情致”与“萧散”来领略其间意趣。纵使如此,对文学“陶冶性灵”之功能,颜之推包容之,却是有限度的接受;享受之,却又是充满自制与戒备。同样地,对于浮艳的文风,对策在于“去泰去甚”;对于文章逸气,则提出“当以衔勒制之”。这些论调与钟嵘、萧纲、萧绎所倡导的“感荡心灵”、“文章放荡”、“情灵摇荡”等文学主张南辕北辙,与裴子野的复古路线也有所差别,无怪颜之推被归类为折中派的

文论家了。

作为南来汉族，又在北方胡族政权下任职，颜之推敏感地意识到这特殊身份可能随时转化为家族的祸端，因而在文学论述里不忘引入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南方旧臣与北方朝官，著述文章，如何拿捏得当，不为人所诟病，确实是一件进退两难之事。然而，正是这类事件，再次彰显了颜之推的折中思想。他援引孟子之说，阐述无论是“不屈二姓”，或是“何事非君”的政治立场，两者不过是各行其道，终究能殊途同归。他一方面以此为自己开脱解难，一方面提出“执两用中”的具体方式：以“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与“时君所命，不得自专”作为染翰挥笔的原则，分别处理作为旧臣新官不同身份可能面对的难题。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一个差池便可能身陷窘境，因而以“文人之巨患”为戒；具体操作时极度考验原则把握的分寸感与灵活度，因而又以“当务从容消息之”加以叮嘱。这样特殊的针对性与高度的危机感，显然与家训性质息息相关，这在其它文论里也是极少见的。

在上述文学议题矛盾处，充分彰显了颜之推力求平衡点，倾向折中的态度。以此观照其家训诸篇，则诚如学者所言“《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道理焉”²⁰⁾，进而可以说这是贯穿全书的基调。折中论所体现的兼容性、自制性与灵活性特点，实则皆为其家训通变思想所统摄，而“所见渐广，更知通变”（《书证》）²¹⁾这句话则说明了其通变思想的根源。颜之推将所见的南北时俗与古今礼节，还有各类人物事迹等材料，大量地安插在家训叙述里，并通过对比，彰显了因时代、区域、种族等因素所引致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比如南北不同习俗至少就有六大类别²²⁾，古今礼教之实践又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乱世之中，士族还要随时面对“为勋贵所逼”（《杂艺》）、“为事际所逼”（《终制》）的窘况。与此同时，作为居北士族言行根据的《礼经》又已残缺不全，许多江南传统习俗正面临着“视听之所不晓”（《风操》）之虞。面对如此多元的

20) 同上注，547页。

21) 这句话原来是指颜之推对小学认识的过程，但实则应当含有超过于此的意义。

22) 胡大雷，〈六世纪南北统一前夕的文化发展趋向——从〈颜氏家训〉所述南北不同习俗谈起〉，《学术论坛》，1989(2)，84—89页。

文化冲突与政治险恶的环境,南来士族难免产生何去何从的迷思。如何化解冲突?这恐怕才是颜之推大量载入与运用这些材料的真正目的。

正是类似这种文化冲突、古今差异、进退两难的记载,充分彰显了颜之推的通变精神。比如《风操》篇记载对于死去的亲人固有其传统致哀之礼节,然而执行过度,以致与酷似先人的伯叔兄弟断绝往来,或“闻讳必哭,为世所讥”、或“多废公事,物情怨骇”等,凡此极端之举皆为颜之推所反对,进而提出“礼缘人情,恩由义断”的原则。至于南北送别风俗不同:“江南饯送,下泣言离”,而“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此孰是孰非?颜之推提出“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此外,身处乱世,往往面对原则弃守的两难选择,对此颜之推指示“当以仁义为节文”(《省事》)。“人情”、“人性”、“仁义”,三者名异而实为一,皆以儒家的权变思想为依归。

面对冲突与抉择,颜之推多次强调务必“消息”以对²³⁾,也就是要善于通变,不偏执,多方斟酌。比如论音辞,则说“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可见强调通变将促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性思考,使其更具包容性与自制力。行之于文,则有“不可强责”(《风操》),“不可具论”(《音辞》),“不可卒除”(《归心》)等论调,以及如《省事》、《止足》、《养心》以宣扬自守静退、少欲知足为主的篇章出现。对忠孝、仕隐、儒佛等差异则以“各有行也”、“本为一体”(《归心》)而予以兼容共存。

颜之推曾借生动的比喻将通变之理具体化为“留有余地”的操作方式²⁴⁾,反映在叙述上首先就是禁止极端,不主张绝对化。比如,对于诚信之德,颜之推告诫“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名实》);对于守墓之礼,颜之推则提出“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终制》);对于求进晋升之潮流,颜之推则主张“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止足》),又申明不

23) 《风操》:“须有消息”;《文章》:“当务从容消息之”;《书证》:“考校是非,特须消息”。

24) “留有余地”是正说,原文见《颜氏家训·名实》:“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

愿子孙如“上土忘名”，但求“中土立名”《名实》即可。如上所分析，在通变思想主导下，《颜氏家训》诸篇所展现的叙述倾向，具有兼容并蓄、自制内敛、适度调节等特征，这与《文章》篇折中论所彰显的特征是不谋而合的。

VI. 结 语

“文体形态是有丰富意味的形式”，它并不是纯语言现象，其语言形式的深层隐含的是丰富的人文内涵。²⁵⁾ 同样是在家训的框架中表达文学观，颜之推与其五世祖辈颜延之的侧重点与表述方式有所区别。对于历代家训之立论方规，颜延之选择“不复续论”，自言《庭诰》的写作“感其素蓄，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主要是围绕着个人的人生经验与感悟之理随性而发，行文用笔多属抒发己见为主，其点评式的文学表述便是最好的例子。反之，颜之推则不嫌重复旧说，开门见山地声明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撰写目，其全书结构、设章命题、叙述方式无不统摄在这一个中心思想底下。《颜氏家训》突破传统片段式或单篇式的形态而以集大成的姿态出现，其防患忧惧之情亦跃然纸上，这与其一生三为亡国之人的坎坷经历，以及“北方政教严切”（《终制》）的周遭环境息息相关。职是之故，颜之推说理训诫的家训意识比起颜延之还要强烈，其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亦受其影响。比如《文章》篇里虽然不乏点评式的表述，但仍然以防患为主，浓厚的训诫意味始终贯穿全篇，这与颜延之家训中的文学论述明显有别。

从语言形式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颜之推在家训论述里的思想特征贯彻到文学论述里，呈现出至少三种各有所偏的论述类型：防患意识促成文祸论，务实为重则促成尚实论，强调通变则引向折中论。三者并非判然对立，更多时候是交融作用，呈现出自成一格的文论特色。对文祸论的回应与关注，以“知决纰缪”为主作为写作指导的细目，以及探讨多元文化对文士的冲击等方面，颜之推都表现得特别积极，所持的论述角度也显得格外独特。相对于其它的文

25) 吴承学.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239页。

学思想,恰是这种被彰显出来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为深入研究北朝文人心态与社会文化,提供了绝佳的视角。其次,从家训到文论,从思考倾向到论述形式,存在于此内在理路的共通性与同构性贯通全书,此则强而有力地印证了研究颜之推的文学思想,绝不可能完全漠视其家训性质的影响。

<参考文献>

- 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东方出版社,1997。
- [日]兴膳宏著、彭恩华译,《六朝文学论稿》,岳麓出版社,1986。
- 张志宏,《从家训性质解读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
- 修艳光,《南北朝文德讨论的终结——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辽宁大学学报》,2009(3)。
-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清)沈德潜选、宋晶如注释,《唐宋八大家古文》,中国书社,1987。
- 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胡大雷,《六世纪南北统一前夕的文化发展趋向—从〈颜氏家训〉所述南北不同习俗谈起》,《学术论坛》,1989(2)。
-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

<Abstract>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Yan Zhitui not only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saying and its revision, but also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on the emerging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 However, this literary characteristic is

inevitably linked to its ideological framework on parental precept. With form analysis assess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shown in the structure and narration, this article is mainly to elucidate the commonality and similarity between literary critique and parental precept in order to denounce the perception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linkage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The conclusion obtained in this study is able to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Yan Zhitui and other literary critics. This particularly provides the best perspective for details research on the scholars' mentalities of Northern Dynasty and its socio-culture.

Key Words : Master Yan's Family Admonition; Yan Zhitui; Northern Dynasty; Literary Critique; Form.